



中国经济文库·应用经济学精品系列

Japan's Economic
System Change and Performance

日本经济制度变迁 及绩效研究

金仁淑
◎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制度性分析》(03BGJ006)、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资助计划”的成果

社科建设项目资助出版



中国经济文库 应用经济学精品系列

Japan's Economic
System Change and Performance

日本经济制度变迁 及绩效研究

金仁淑
◎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经济制度变迁及绩效研究/金仁淑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 - 7 - 5136 - 0381 - 2

I. ①日… II. ①金… III. ①经济制度—研究—日本—现代 IV. ①F1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8871 号

责任编辑 夏 兵

责任审读 贺 静

责任印制 张江虹

封面设计 华子图文设计公司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 刷 者 北京市昌平区新兴胶印厂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86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6 - 0381 - 2/F · 18656

定 价 45.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 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8359418 010 -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 (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 - 68344225 88386794

代 序

金仁淑教授撰写的《日本经济制度变迁及绩效研究》，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科学地把日本经济制度变迁界定为“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并系统地论述了该制度形成、发展、完善的过程以及它在日本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和存在的缺陷。本书提出的观点对从高度计划经济制度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中国来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日本是幅员和资源都很有限的岛国，在中世纪前还属于默默无闻的后进国家，但是进入近现代以后却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奇迹”。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20世纪70年代的100年间，日本不仅摆脱了在资本主义起步上晚于欧美100~200年的落后局面，而且发展壮大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近20年来，日本经济明显地呈现了震荡和滑坡的趋势，但在高科技产业的许多领域仍处于世界的前列，还具有发展的潜力。日本的近现代经济史很值得深入研究和总结。金仁淑教授的这部新作，从制度变迁和绩效的高度对日本近150年的经济发展进行了研究和总结；为国内外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萧条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而书中提出的日本政府主导型强制性制度变迁有利于赶超，不利于自主创新，今后的制度创新应以诱致性变迁为主，适当地结合政府强制性制度安排为特征的新的制度变迁模式等的核心观点很有见地，也颇有理论价值。

对于处于近现代历史时期的后进国家来说，建设和发展市场经济制度，使本国走上工业化和市场化道路，是国民经济能够健康、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其他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多寡和优劣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些生产要素能否被合理开发，能否被有效利用，能否使其创新和升级，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力，造福于社会 and 人民大众，却

取决于制度的优劣。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二者结合、互动的体制和机制。资本、技术、劳动力和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短缺,可以通过国际市场来调剂和弥补,而制度只能生长在本土上,并且不可避免地渗透自己的历史传统、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因而是不可借用、移植和替代的,只能靠自身来塑造和完善。在制度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是政权。集立法、司法和行政等三权于一身的政权,既具有公共品的性质,又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具有调整制度、改变制度的能量和进行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的权势。所谓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即政权受到内外某种压力或出于某种目的,通过命令和法律等强制手段,对现存制度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从经济角度来说,近现代史就是世界走向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历史,就是先进国家利用廉价商品征服落后国家的历史。对于落后国家来说,要想摆脱被先进国家征服的命运,必须革除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尽快走上工业化和市场化的道路,同先进国家并驾齐驱走入世界民族之林。在这条道路上,日本是先驱,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典范。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和二战后两次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建立和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实现了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的愿望。时过境迁,现在,日本国内外面临着诸多矛盾,因而面临着第三次制度变迁的考验。是延续还是放弃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道路?是坚持还是改变政府主导性的经济模式?这是摆在日本朝野的最大课题,也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门话题。金仁淑教授撰写的这部新书,对这个话题提出和阐述了自己独到的观点,很值得重视和参考。

池元吉

2011年3月10日于长春

前 言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经历了两次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经济制度变迁,逐步确立了具有日本特色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日本步入了发达国家行列,创造了“日本奇迹”。日本实现现代化的经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很多国家不断地探索日本成功的经验,并开始效仿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不仅打破了“日本奇迹”,而且也使国际社会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前景深感忧虑。日本经济正经历着第三次制度创新的转折期,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经济制度面临着向以市场为主导的诱致性制度转变的新阶段。而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经济制度变迁在日本实现近代化、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后现代化阶段所面临的挑战,要求我们进一步客观、理性地评价该制度的变迁,避免盲目效仿或否定。

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引进了市场经济制度,这是在政府主导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伟大尝试,是一场意义深远的制度变迁。显然,中日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但从制度演变的特征来看,中国与日本都采取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其最大的特点是: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其制度变迁具有“强制性”和“计划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吸取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特点,科学地采取了“政府主导的计划”和“市场调节”两个手段,及时地调整经济建设中出现的一些矛盾,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健康的发展。因此,从历史发展的某种角度上看,中国目前经济高速增长与日本两次经济腾飞时期的确存在某些相似之处,而如何处理好经济增长中出现的很多不平衡的问题,将决定两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进度与成效,值得我们认真地进行研究。

日本经济制度变迁的经验表明,不同的制度形态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别。经过对日本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经济制度变迁的研究,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到邓小平同志“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1992)这一英明论断的深刻内涵。显然,一个国家的制度结构能否对于资源配置产生有利的影响,取决于经济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是否存在作为补充的民间经济组织。所以,各种经济制度的建立、调整、创新等制度变迁步伐要与一国的具体国情相适应,必须要以解放和推进社会生产力为前提。对制度有效性的判断要依据经济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并不是制度越先进对该国就越有利。因此,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绩效时,绝对不能把“政府主导的计划”和“市场调节”作为评判标准,更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

客观地看,日本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及相应的经济政策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即强制性制度安排使日本成功地实现了赶超型发展战略,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自主创新精神的形成,影响了企业应对市场需求的能力,进而拖延了市场型发展战略的实施,最终使日本经济陷入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期的萧条。这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对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从政府主导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21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书是笔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强制性制度安排的缺陷与纠正——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制度性分析》(03BGJ006)的最终成果,也是近年来笔者对日本经济萧条根源及今后日本经济制度创新进行深入研究和剖析的结晶。

本书从七个方面阐述了日本在明治维新和二战后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如何成功地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又从战争的废墟中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后发国的经济奇迹;深入探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迫使日本又要进行一场新的制度创新的各种轨迹;从客观、理性的角度提出今后日本经济制度的变迁不能完全按照欧美的标准采取彻底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而应以诱致性变迁为主,适当地结合以

政府强制性制度安排为特征的新的制度变迁模式。而本书所提出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适合赶超型发展战略,诱致性制度变迁更适合自主创新型发展战略的核心观点对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章集中介绍了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制度的内涵、构成以及制度变迁方式和政府作用的理论,确定了日本市场经济的特征为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探索了日本经济制度变迁的理论基础,并以制度作为日本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提出了强制性制度变迁效应的双重性是日本经济增长和萧条根本原因的创新性观点。

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中,我们很容易发现政府在制度安排中的重要作用和缺陷,这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国家在制度创新中的“诺思悖论”^①。因此,笔者认为:决定日本经济的增长与衰退的根本因素均在于制度,即当以政府为主导的制度安排与创新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时,其制度为有效的制度,就能促进经济发展;而当原来的制度已经不利于新形势下经济发展的新目标时,其制度为无效率的制度,进而阻碍经济发展。从日本经济制度变迁的路径中可以看出,导致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原因并非日本独有的特征,也不是无药可救的顽疾,只要认清其病因,找出相关对策,实施长期的、彻底的制度改革,日本经济仍将得到持续的发展。而所谓改革就是通过制度创新,最大限度地适应经济发展,即顺应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要求,实施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

第二章重点阐述了日本强制性经济制度建立的制度环境,明治维新的内容、历史意义及制度缺陷,分析了日本确立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征及效应。明治维新最根本的特点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新的制度均衡,不仅使日本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走上了国家富强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且加快了实现近代化的速度,极大地降低了制度变迁成本,为后发展国家制度变迁方式的选择指明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是,由于当时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低,资产阶级的力量较为软弱,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因而国家的领导权落

① 国家既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也能导致经济的衰退。

在中下级武士手中。由于他们仍保留着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故日本逐步走上军事帝国主义道路,成为战争的策源地,导致明治维新制度创新的绩效几乎消失殆尽。

第三章深入研究了二战后外生强制性宪政转轨下日本经济制度创新特征及绩效。本章从二战后日本宪政转轨的特征及作用中解析日本第二次制度创新的制度环境,并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中政府理论和三大经济民主化改革作为理论和经济基础,深刻剖析日本政府由战前的制度供求二元主体转变为战后只提供制度供给单一主体的深层原因;从政府主导型制度体系的宏观和微观特征及绩效的实证分析中,进一步探索日本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创新的特征及其在经济高速增长中的积极作用。显然,日本根据二战后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市场经济体制先天性发育不足的客观条件,采用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经济制度变迁方式,不仅弥补了以市场为导向的自发性制度变迁的不足,促使制度供求均衡,而且发挥“后发优势”,极大地缩短了与发达国家间的距离,加快了日本实现现代化的步伐,顺利完成了“赶超型”发展战略。

第四章着重阐明了“后赶超型”时代日本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缺陷,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这一国际经济制度环境的变化对日本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冲击及对日本金融体制、企业竞争力所造成的影响,由此解析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根源。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加上国际经济环境的日趋复杂化,日本面临着由“赶超型”经济向与欧美国家处于同一水平线的“创新型”“竞争型”经济转轨的现实抉择,即以政府为主导的日本经济体制的优势及其绩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日本经济制度缺陷的大暴露迫使日本政府考虑该如何准确地把握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并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可以说,90 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并非是单纯经济危机的表现,而是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下日本经济中各种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的结果,意味着过去有效发挥作用的政府主导型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全面滞后,而“赶超型”发展战略没有及时转换成“创新型”发展战略是制度缺陷生成的根源。

第五章在系统梳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历届日本政府改革措施及效应的基础上,通过政府宏观政策失败案例和制度成本的实证分析,深刻剖析了

日本宏观经济发展战略贫困及制度根源,进一步阐述了日本僵化的政治体制在不同制度背景下,从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制度演变成阻碍经济发展的无效制度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贫困,一方面体现在国家发展目标的迷茫、经济结构型矛盾等制度约束上;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对制度变迁成本估计不足,没有处理好体制改革和刺激景气之间的关系,造成政府宏观政策的失误,这加剧了经济的进一步衰退。此外,以多元官僚制为特征的日本政治制度也成为经济制度改革的绊脚石,使经济制度改革更加缓慢和艰难。因此,没有经济、政治及社会制度的全面改革,而仅仅依靠经济体制的调整很难彻底摆脱日本经济的萧条,即制度的互补性及其合理结构是一项新制度充分发挥效应的基础和前提。

第六章开拓性地提出日本第三次制度创新的理论基础和具体措施。任何制度的安排都是以新兴技术和全球性市场制度作为其外部条件,需要政策代理人对经济的准确判断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当日本经济转入“创新型”阶段时,以企业自发探索为基础的诱致性变迁是比强制性变迁更为有效的途径。然而,今后日本经济制度的变迁,也不能按照西方的标准采取完全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日本第三次制度创新要构建以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适当结合政府宏观创新主体作用的多元创新主体结构,并注意制度规划和方式的选择,以充分调动市场自发性改革和基层单位的主动改革,为企业的创新赋予激励机制和活力,重新调整以经济产业省为代表的政府机构在经济制度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实现新型日本经济发展模式^①奠定良好的制度保障。

第七章全面总结了日本经济制度变迁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有益的启示。从经济发展阶段及市场经济成熟程度来看,中国和日本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在市场经济制度的演变过程中,中日均体现出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特征,即政府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主体,为中日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政府主导下制度变迁的固有矛盾日益暴露出来,中日均面临着市场经济制度创新的新阶段。

^① 有关“新型日本经济发展模式”参见日本经济产业省《日本新经济增长战略(2009—2010)》。

而日本三次经济制度创新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成功的制度必须要适应本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适应国内外制度环境;制度创新模式应当顺应国内外制度环境的变化而与时俱进;政府在不同的制度模式中应及时调整其地位和功能,激发微观企业和个人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作用;要重视路径依赖对制度创新的作用及制度变迁效率的影响。回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多年的经验,也在政府主导和市场经济体制中不断地寻找着制度均衡点,而日本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目 录

第一章 日本经济制度变迁理论溯源 / 1

第一节 经济制度理论概述 / 2

第二节 日本经济制度变迁的特征与效应 / 24

第二章 日本强制性经济制度的确立 / 33

第一节 强制性经济制度建立的社会环境 / 34

第二节 强制性制度创新的特征 / 38

第三节 强制性制度创新的效应 / 46

第三章 日本强制性经济制度的完善 / 57

第一节 二战后的新制度环境及基础 / 57

第二节 二战后的强制性经济制度特征 / 66

第三节 二战后强制性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政府作用 / 85

第四节 二战后的强制性经济制度绩效 / 92

第四章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日本强制性经济制度的缺陷 / 118

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对日本经济制度的冲击 / 119

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与日本经济的困境 / 130

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凸显强制性经济制度弊端 / 145

第五章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制度变迁及效应 / 165

第一节 日本经济制度改革成效及问题 / 166

第二节 日本经济制度改革失效的成因 / 179

第三节 日本政治体制对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 / 198

第六章 日本第三次经济制度改革新探索 / 208

第一节 创建新制度体系 / 209

第二节 建构新制度措施 / 216

第三节 重塑充满活力的企业制度 / 231

第七章 日本强制性经济制度变迁的经验与教训 / 246

第一节 制度创新模式要适应制度环境 / 247

第二节 制度变迁主体功能应与时俱进 / 255

第三节 注重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 262

参考文献 / 268

后记 / 284

第一章

日本经济制度变迁理论溯源

在发达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日本通过明治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安排,成功地实现了由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二战后仍然采取以政府作为制度供给者的制度变迁方式,完善了以强制性制度为特色的日本式经济发展模式,成为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典范。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的长期萧条,不仅打破了“日本奇迹”的神话,而且也使日本社会对本国经济发展前景深感忧虑。^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其原因既不是人们常说的能源与资源的制约,也不是环境问题。可以说,迄今关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尚不能真正解释日本经济增长出现停滞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日本经济增长与萧条的原因都应从制度创新方式的选择与双重效应来解释。而且与传统研究不同的是,在日本经济发展中长期以来,被称为日本特色的政府的作用,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效应,而强制

^① 日本经济的兴衰也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一方面是因为日本一度身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它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国际贸易、金融、投资等有着多方面的影响,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日本的实践提出了许多值得研究的经济问题。诸如如何有效监测和预防泡沫经济、如何解决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如何恰当运用积极财政政策的问题,等等。尤其值得探讨的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如果能够从日本的实践中吸取教训,对于中国等其他国家、特别是尚在追赶途中的国家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将大有裨益。

性制度变迁主要适合于实施“赶超型战略”阶段,在该阶段政府的积极作用凸显;当经济步入“自我创新型战略”阶段时,则需要以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为主,应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因此,本书将把制度作为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内生变量,而把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勤劳的国民性等看做有效的制度安排的结果,来深度分析日本经济增长和萧条的根源。

本章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界定日本经济制度变迁特征,分析日本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理论渊源与现实效应,为 21 世纪日本向诱致性制度变迁过渡奠定理论基础。

[第一节]

经济制度理论概述

现代经济学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及制度变迁理论,都对经济增长的源泉及内生机制进行了分析。其中以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长期看可称之为唯一的动力;而以罗默(Paul M. Romer)和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则认为,生产要素的收益问题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罗默,1986);各国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各国在收入和经济增长率方面的差异,扩大经济的开放度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吸收新技术和人力资本,从而更快地实现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卢卡斯,1988)。显然,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制度被视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然而,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所采取的制度的差异所带来的不同的经济增长,导致了对制度重要性的重新诠释。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本身,因此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诺思,1994)。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交易费用的降低,而降低交易费用的关键在于制

度变迁。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对一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通过两方面来体现:一方面,制度创新就是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因;另一方面,有效的制度可以降低技术进步和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根据以上经济增长理论,笔者认为,日本经济兴衰的根源在于制度变迁及其效用。

一、制度内涵、构成及功能

制度由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及实施机制组成。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制度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与传统的理论中把制度当做既定的外生变量不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是稀缺资源,因此,制度是一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经济发展实质上是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的制度变迁过程。过去很多人把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匮乏看做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其实,这些国家资本匮乏的主要成因在于制度安排的缺乏,^①有效的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资源的最优配置,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一) 制度内涵

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把制度解释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②这种控制是通过所有权关系来实行的,而在集体行动中,最重要的是法律制度。格鲁奇(G. Gruch)认为,各种类型的制度都具有规则性、系统性或规律性的共同点,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制度是构成统一整体的各个项目相互依存或相互影响的综合体或图式。^③

马克思认为,制度包含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而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制度变迁或历史演进的根本动力。制度的本质就是在社会分工协作体中不同集团、阶层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发

① 因此,资本主义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没能成功的原因并不是没有启动资本,而是因为没能长期促进和保障资本积累的法律制度环境。

② [美]康芒斯. 制度经济学. (上册)[M]. 于树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2: 87-89.

③ [美]格鲁奇. 比较经济体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5.

展如何推动生产关系的变化,从而导致包括法律、意识形态在内的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包括经济制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曾有这样的论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①

诺思说,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他将制度定义为“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他把博弈规则分为两大类:正式规则(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和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习俗)。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如果本土的(Indigenous)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是,借鉴来的制度可能既无法实施又难以奏效。^②新制度经济学家经常使用“制度安排”这一概念。制度安排的定义是管束特定行为模型和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制度安排可能是最接近于“制度”一词的最通常使用的含义了,或者说,制度安排是制度的具体化。制度安排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它可能是暂时性的,也可能是长期的。制度安排至少有两大大目标:一是提供一种结构使其成员的合作获得一些在结构外不可能获得的追加收入;二是提供一种能影响法律或产权变迁的机制,以改变个人(或团体)可以合法竞争的方式。^③

青木昌彦归纳了博弈论视野下的三种制度观。他认为,将经济过程类比为博弈过程,不同的经济学家分别将制度看做博弈的参与人、博弈规则和博弈过程中参与人的均衡策略。青木昌彦同意第三种看法,把制度看做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 [美]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225-226.

③ 例如,使公司合法化的法律提供了一项制度安排就体现了制度安排的两大目标。